

欧盟城市化对我国的启示

吴老二¹, 曹骥赟¹

(1.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 天津 300071)

摘要：城市化现象最早出现在欧洲，而我国正处在城市化加速的阶段。我们从欧洲城市化历程的研究中可以发现：我国工业化的市场背景、市场状况以及城市化的主体——农民的兼业化就业机制与欧洲某些时期有相似之处，但也存在很大的不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为此我们可以在借鉴欧洲城市化的教训，在培育国内市场、消除国内市场分割以及增加农民的有效城市化需求方面采取一定的措施以加快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并尽量少走弯路。

关键词：城市化；市场分割；国内市场

中图分类号：F **文献标识码：**A

欧洲城市和城镇同经济在时间和空间的协同演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不仅在于历史繁多的细节和多样性的事实，而且在于变化的轮廓和性质难以把握。在较长一段时期中，城市系统既存在稳定性，也存在促成新变化的累积性的非均衡。欧洲城市总体发展分为两个阶段：一是生产区位上的聚集，二是从聚集中得到好处的生产者再选择新的区位。同时他们的选择会改变新区位的人口的重新分布和经济特征。

一、欧盟城市化的历程

1. 工业革命前的欧洲城市空间模式：

在公元9世纪或者10世纪时，欧洲仅是东部东罗马帝国和穆斯林帝国的外围区。拜占庭和科尔多瓦实际是当时欧洲最大的城市。在公元一千年之后，欧洲西部的城市形成和发展步伐开始加快。到13世纪时，清晰的模式出现了，在内海海岸附近出现了两个核心：地中海/亚得里亚海和北部/波罗的海。许多城镇和布满城市的线路将意大利北部和诸多零散的国家联系起来，从西部的巴黎延续到东部的德国。贸易则沿着这些网络通道流动起来。在两个核心的外部区域，许多建立在沿海沿岸的港口成为内地产品运往核心的中转站。当核心向东或向西扩展时，城市密度随之降低，像杜能模式那样，耕作农业让位于牧业，总之，南部比北部拥有更多的城市，意大利核心比荷兰核心更加发达。然而，无论中世纪欧洲的城镇多么活跃，其大部分规模都很小。

14世纪除了东部的波兰，欧洲其他地方的城市发展都停止了。这时人口居住密度大的地方出现了向使用低水平耕作工具的农业的回归。公元1315年欧洲爆发了瘟疫，城市发展受到了重创，虽然15世纪在城市的内核发生了文艺复兴，但是恢复的速度是缓慢的。城市中的居民死亡率很高，使得想到城市寻找机会和希望的农村居民大量流往城市，因此，正是由于这个时期移民的频繁流动，才使得许多市民大量死亡后的空城重新被人居住并持续下来。

这个时期的欧洲市民倾向于一个大家族聚居在一起，并且认为越接近城市中心越能体现出自身的名望，因此此时的欧洲城市内部空间很狭小，市场和人们集会的公共空间既有限也难于扩展，街

道拥挤不堪。水运优势对于城市尤为突出，许多城镇由于位于海岸线上或有江河流经而变得非常有吸引力。

这个时期的欧洲专制主义盛行，以城市化为标志的欧洲扩张相对为中性。初期的 16 世纪属于从中世纪后期的灾难中的恢复阶段，末期 18 世纪出现了迅猛城市化和人口剧增的先兆，而中期的 17 世纪欧洲大部分地区又陷入另一种危机。在整个现代化初期，两种重大力量决定着城市的变化：一是强大的中心化国家的形成，尤其在封建制度最强大的地区；二是欧洲贸易、定居区和对海外殖民地及东方控制区的扩张。这个时期欧洲北部超过了南部。比利时的安特卫普、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和伦敦成为持久的金融和商业中心，而热那亚、威尼斯和佛罗伦萨却落伍了，然而直到 19 世纪，南部的整体城市化水平仍然高于北部。

城市核心的边缘部分的超过了核心中央，尤其是在成长速度最快的城市。成长最快的从主要是一些国家的首都，从马德里、里斯本到柏林和圣彼得堡，而像伦敦、巴黎和那不勒斯的规模（50 万人口或者更多）是自罗马帝国以来，西方基督教世界所没有见过的，同时，封建王朝的力量也产生了一些捍卫自身统治的城镇如港口，关隘和驻军要塞。原始工业最初出现在城市核心的周围，从英格兰西部到意大利北部，仅在伊比利亚以及欧洲中部有零星的分布。而到 18 世纪时，当这个运动达到顶峰时，就已经涉及到一些较大的地区，包括西班牙南部，法国北部，瑞典以及爱尔兰东部以及德国的大部，然而一些阿尔卑斯山地区却出现了衰退。

到了 17 世纪，成长性主要反映在大城市中，许多小城市开始衰落，这就是为什么这个时期尽管有许多城市的壮观发展，但总的城市比例没有提高的原因。不仅一些小城镇失去了发展为城市的机会，而且佛兰德斯和意大利北部的核心区域发展出现了困难。也有学者认为封建专制制度尽管促进了首都和带有统治色彩城市的发展，同时也制约了欧洲整体城市比例的提高。在已建立的城市区域中统治力量强大，而在这些核心的外部这种效果则大大减弱，不利于外围城市的发展。位于首都附近的一些城市难以壮大即表明首都对其有一个负面影响。港口城市在这个时期崭露头角，超越了由经济增长驱动城市发展的许多内陆城市，尤其在大西洋沿岸，从加的斯到格拉斯哥。当然，由于港口城市往往位于网络系统中，因此与中心地系统的首都城市相比，虽然前者人口规模不及后者，但经济活跃水平强于后者。

劳动力、资本和信息流动性随着城市发展有所增加。由于以前造成的巨大人口缺口，城市吸引了移民的不断涌入，城市另外还衍生出许多机构，从银行到印钞厂，它们推动着有形或无形资本的流动。通往海外的远距离贸易在这个时期也扩张了。贸易政策成为权力政治的一部分，进一步导致海外扩张与征服，产生了侵略性的海运、贸易的营利主义政策。这样导致了许多城市彼此间的兴衰更替，直到 1815 年，拿破仑试图控制欧洲海岸线（从而可以打击依赖商业的英国）的结束，许多中央政府才放松了对贸易的苛刻限制，但大多保留了关税作为控制贸易的工具。这个时期城市的制造业扩张了，虽然技术变革受到制约，大规模产品生产主要局限于所谓的“制造业”，这主要是皇家创办的生产奢侈品和军工品的工厂，它们在随即到来的工业革命中，不占有任何地位。然而乡村家庭手工业和其他小规模工业以及大量从事这些业务的生产者对社会具有更大影响。这个时期的“制造业”同城市的关系、它的区位及它与即将到来的机器化大生产的关系产生了复杂并难以消除的问题，两者需要分别考察。

2、工业化时期的城市形态

从整体上看，工业化时期欧洲的人口出现了激增，生活在城市的人口也出现了猛增。这个趋势的前期和工业化之间并没有直接的联系，因为在部分欧洲国家比如俄罗斯、意大利以及出现大饥荒以前的爱尔兰，在产业革命几十年以前就出现了这种现象。然而，城市化的第二阶段和产业在欧洲国家之间的发散却不是那么相一致。在这里我们先不讨论城市化的人口统计学，但是我们可以说，

即使农村人口也在增长，城市人口的加速增长使得城市依然能够出现扩张。也只有在这个阶段，由于受劳动节约型农业技术以及农村非农业就业部门失败的推动，以及国内外地区的吸引，才会出现普遍的“离开农村、进入城市”现象。

这样，就绝大部分城市而言，城市的增长靠农村移民的推动，尽管大都市地区人口的激增也因为它们从那些较小的城市沿中心地等级向上吸引了部分人口。而且事实上当那些移民主要来自出生率较高地区时，他们的生育行为马上被城市居民所同化了；而当公共健康以及卫生条件的改善降低了城市过高的死亡率时，降低的出生率将保证城市的自然人口增长以适度或者以负的速度增长。

为了更清楚以及经济的说明问题，我们可以将由于工业化导致的城市类型分为以下几类：

(1) 当地以及区域的中心至少在早期会出现扩张。但是我们经常忽视了这一事实：农村人口，不管他种田与否几乎在所有地区都会出现增长，直到出现了所谓的现代增长方式为止或者直到人口统计学发现向外国或者城市内向外的移民减轻了土地的压力为止。农业随着轮耕制、可转换管理以及其他增产技术的推广得到了强化，然而节约劳动型的机械化只有逐步推行。随着商品化程度的增加以及通信条件的改善，在铁路普及以前，这些因素减缓了它们进步的速度，并使得这种进步变得不平衡，同时它又刺激了城市中心的发展，使得它们沿着最小规模等级的城市向上发展。而那些我们通常认为属于传统小城镇的许多服务，比如店铺、药剂师、律师或者公证人、马车制造者、裁缝以及酒店老板可能也就最早出现在 19 世纪（或者出现在十八世纪中期的英格兰）。更进一步，省级城市并不和新工业经济活动中心相匹配，其中许多城市逐渐成为劳动力的存储地，使得他们可以被一些常规制造业比如造靴以及制鞋业所使用。这种行业分散化的现象是成熟产业制度的一个特征，并且预示着 20 世纪将出现更为精巧的分散化现象，不管我们从战略、成本最小化还是发展的目标的角度出发均是如此。

(2) 工业城市区域由于各种不同的原因而出现。一些城市围绕着自然资源产地，比如煤或者铁矿而出现，有的或者围绕着初始工业化集中的城市而发生。这些城市比如谢菲尔德以及伯明翰之所以取这样的名字就是因为这些城市的主要产业扩散到了较远的地方。城市——区域产业可以不在早先的城市中心出现，而在那些与城市增长相结合的部分出现。这样的例子有斯塔福德郡、莱斯特以及鲁尔，它们通常在这些城市的卫星城出现。最后，工业区域可以组成更富有结构性的城市系统。比如在英格兰，曼彻斯特是中心，利物浦是登陆、离案港口，但是大量的棉纺厂实际上成环环或者双环的形状围绕在曼彻斯特的周围，而距曼彻斯特不远的圣海伦城就负责向纺织行业提供至关重要的化学制品。

阿尔卑斯山区产业集中带表示的是即使今天都不能充分解释的殖民地形式。在欧洲许多地区的山谷高地里，但是最显著的还是在阿尔卑斯地区，初始工业逐渐地实现了现代化，他们都采用了工厂化的组织模式以及使用动力机械等形式。中小企业以及机构的连续布局模式已经被其他优势所补偿，进而导致出现了所谓的“弹性专业化”系统（Piore, Sabel, 1984）。瑞士的制表行业就是个极好的例子，但是该国也生产种类繁多的产品，从高质量的纺织品到管道甚至还包括布谷钟它们都生产。工人们倾向于住在环绕山谷的小城市里面，而主要中心城市取的都是那些相当不熟悉的名字，比如圣柔勒、艾尔博费而德、巴门、帕托或者佛尔佛斯等。

(3) 大城市的工业在这段时期也得到了发展，尽管和上面所列的城市相比他们并不是占主导地位或者那么显眼。在那些现有的城市里面，大多数经济活动出现在较小的企业里，外观上和初始工业化时代家庭以及手工业作坊的形式差别不大。事实上，电力时代的到来给小规模生产带来了新的推动力，因为它使得那些加工设备比如缝纫机以及加工木材、金属以及皮革的动力工具的布置更加紧凑以及灵活。另一方面，重工业则通常位于郊区，或者红线区甚至是卫星城。整个郊区可能被一个企业所占据，比如柏林周围的西门子公司、巴黎外围布伦的雷诺汽车公司。在城市内部，工厂操作

分区、工厂以及车间所占用的土地逐渐被一些更加重要、繁华的金融以及商业所代替。

假设大城市里面运输工业产品会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从原材料的运输到劳动力以及土地资金的支付等,因此就有必要进行优势补偿。而在较早的时期,关键财产是体现在产品中的信息。那些古老的评价劳动熟练程度、风尚以及唯一性的标准现在已经变为综合考虑技术的复杂程度以及创新性。最初的原型可能在大城市被制造出来,但是大量的常规生产一般可能会在成本较低的地方进行生产。这就意味着产品周期,用 Jane Jacobs 的话来讲,创新的工作显著的具有大都市地区的特点。(Jacobs, 1969, Gaillard 1977)。最近以来 P. Aydalot 以及 D. Keeble (1988) 对工业的早期阶段做了对比,结果他发现,工业化早期的特征是小型企业的空间集中,到后来,(可能创新性会减弱)企业的规模变大了,但是企业的生产却变得更加分散化了。

(4) 还有一个值得一提的城市形态没有列出来。除了英国以外,很难再找到真正具有中心地模式特征的较新的城市或者在城市网络中起领导作用的城市,而这些城市均是城市工业化的结果。只有曼彻斯特是个例外,有人可能会把达赛尔道夫(早期的一个较小的宫廷城市)、利兹、布拉德福以及毕尔巴鄂增添到这个名单上,但是更多的人可能不会这样作。一些港口城市比如利物浦、格拉斯哥、勒哈维以及不来梅港逐渐变得很重要。而对余下的城市来讲,尽管他们增长速度很快,城市规模可能会变得很大,但是它们的产业结构很少能发展成为较高等级中心。这就意味着一种网络逻辑:即使在那些很受欢迎的地方它们也能达到较高程度的专业化程度,而且它们的许多功能都依赖于进口,同时它们和其他城市又保持着较好的联系。当然,产业结构会逐渐得到优化,从商店到文化、教育以及卫生机构,但是这一过程通常存在时滞,并且一般仅为当地市场所服务。因此,如果人们关注人口的变化,就会发现工业化对都市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但是并没有产生多大的城市系统的重建力量,尤其是中心地等级以及大都市城市的重建力量。总之,不管人们考察其政治、文化地位,还是金融以及商业的领导地位等,那些先前就存在的较大且重要的城市仅仅是变得更大以及更重要。部分城市,但不是所有的城市,因为作为国家首都,它们需要在全球的金融以及商业方面获得领导地位,因而就出现了两个城市在中心地等级的顶端相互融合的现象。

在大都市地区我们可以清楚观察到土地使用方面的两大变化是工作地和居住地的分离,一旦人们不是很紧密的和工作地保持联系,就有可能出现均质社会性的社区。但具有讽刺性的是,居住在外围区位的欧洲工人却是最后一个有权选择在何处居住的人。那种比较古老的模式,比如住在商店的上面或者是按照高贵、卑微的社会等级梯度住在一栋多层建筑物内,它们逐渐就会变成具有同质性的公寓、排屋或者分开的别墅。而交通的进步,尤其是公共汽车、铁路、有轨电车、地铁、汽车以及摩托车的出现,显著的降低了交通成本并且提高了质量,它们是进步的关键因素。尽管每个城市都有其独特的发展经历,但是在新经济地理学看来,它们存在两个共同的特征:一个就是,欧洲城市的精英分子不会向美国的同行那样很轻易的抛弃城市,就英国而言,它处在居间的位置上。另一个就是,城市从中心向外的扩张遵循扇形的模式,经常出现西边住中产阶级而东边住平民群体。

现在所有的城市以及城镇都卷进了城市化的浪潮中。某些特定的区域失去了它们在初始工业化时期的作用,而这反过来又影响了它们中心的发展。就像我们前面指出的那样,从农业中开始分离出劳动力,最早出现在 19 世纪中期的英国(工业化的区域可能更早),到后来欧洲边缘部分才出现这种现象。较小农村中心的作用逐渐被较大的城市所取代,随着汽车的出现这种趋势得到了强化。而且尽管次要的轻轨网络也出现了扩张趋势,较小城镇的命运仍旧依赖于它们是否被一条铁路所服务。那些早熟且城市密度较高的区域、地中海周围地区古老的核心以及地势较低的欧洲国家的工业化比较滞后,而且城市增长也比较缓慢。最后,较老的网络节点城市,其中许多曾经有过辉煌的过去:它们曾是地区或者欧洲的金融以及商业中心,到现在已经落伍了。鲁贝克、威尼斯、布鲁日、奥格斯堡、拉罗谢尔以及其他的许多城市现在只能寄希望于作为生活的博物馆发挥作用。在 20 世纪后半期,由于在第二次经济腾飞阶段它们的工业并没有得到发展,它们可能只能作为新经济以及居

住之地。

3、20 世纪初期的城市化

在 20 世纪前半期，许多因素导致城市增长速度放慢并使得城市系统趋于稳定。战争以及萧条放慢甚至有时候倒转了从农村到城市的移民流，然而由于政治原因引入的移民相比农村居民而言（不象早期情形），它更多的影响了城市居民。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破坏被限制在比利时以及法国北部地区，西班牙的列日、里尔以及马德里是仅有的几个遭受破坏的大城市。

这种城市化进程的减速，尤其是 20 年代（英国和德国）以及 30 年代（法国）极大的影响了那些专业化生产工业范围狭窄的，比如采矿、冶金、金属加工以及纺织等工业拥有卫星城的大都市地区。尽管在战争期间，重新装备部队以及重建逆转了这种趋势，它预示着最终这些铁锈地带将走向衰落。新工业，比如那些制造以及加工轻金属以及石化产品的行业都转换成了制造塑料、器具、车辆等等，它们需要寻找另外的区位。港口以及大都市地区吸收了全部的份额，但是不会出现像上个世纪那样的大规模集中现象。当然，帝俄后期以及苏联时期，为了补偿工业化延迟，它们在乌克兰以及乌拉尔地区沿着新老城市发展了采煤、炼铁以及工程复合企业。

尽管经济增长缓慢，但是城市生活的质量却出现了大幅的提高。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基础设施赶上了以前增长的需要，但原因还不仅在于此。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技术主要集中在电力、化学以及生物的进步上，它使得城市出现好转。卫生设施以及社会保障都出现了好转，污染消失了，城市内部的交通实现了彻底的改变。行政管理以及公共健康的进步，投票权的逐渐扩大（刚开始的时候只有男人有投票权）也促进了这种进步。最为显著的是开发了社会性的住房，不仅供给量增加了，而且标准也提高了，在大城市拥挤现象是最严重的。在别处，企业规模的增大使得向雇员提供住房的可能性增加了。

欧洲和美国城市的显著的区别在于前者的城市中不存在摩天大楼。即使在 1914 年战争爆发前，在 Belle Epoque 那些紧张的日子里，它们也并没有象纽约以及芝加哥的中央商务区那样利用电梯以及建造结构性的钢建筑。如果人们从整体上拓宽城市建成区的观点，欧洲城市的密度更大而不是更小。除了北欧以外，那里排屋占主导地位，而以前占主导地位的形式是公寓住宅，4 - 7 层高。这可以在从那不勒斯到爱丁堡，从马德里到莫斯科的范围内见到。

4、20 世纪后半期的城市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自 14 世纪大瘟疫以来对城市造成最大影响的事件：空袭、炮战、巷战等每件事都会造成大量的破坏。而且，战争期间以及战后有大量的难民逃离城市，但他们很少有人知道自己的目的地到底是哪里。经济生活在许多地方几乎停顿了，而征收财产又给战争以及占领军造成的惨剧增添了新的悲剧。尽管很多人注意到了战后欧洲的经济奇迹，事实上大多数的欧洲城市在战后十年内经历了象“三十年大繁荣”那样的增长。

而同样让人吃惊的是，战后城市的重建中城市结构以及建筑物仅发生了很少的变化。街道的设计以及土地的利用很少发生改变或者激进的革新。尽管某些街区已被夷为平地，但是无形的制约仍旧存在：地下的污水以及供水管道等基础设施，有时候也包括电线、电话线以及其他无形的财产权。重建工作相当紧迫，甚至有些地方还需要修改。这样古老城市的核心保留了弯曲而狭窄的街道，那些地方很快就变成了价值昂贵的步行街了。而对建筑物而言，在开始的时候，质量普遍都很差劲，但是需求却是无限的。那些遭受严重破坏的城市要么建成以前时代的形态（如卡恩，华沙），要么就建成现代化的样子（如罗特丹，东柏林）。

5、最近以来欧盟的核心——外围模式现状

最近通过对欧盟的人均 GDP 以及每个国家的 GDP 进行绘图可以发现：欧盟的区域收入表现出一个清楚的核心外围模式。我们可以将那些收入较高且差距相差不大的国家确定为欧盟的富裕区域核心，而将那些收入较低且差距较大的国家确定为外围部分。结果我们发现，欧盟这种范围较广的核心——外围模式因自 1980 年代中期以后欧盟国家收入的趋同而出现了轻微下降。但是，欧盟范围内的核心——外围模式还是很稳定。

另一方面人均 GDP 较高的富裕核心和欧盟市场之间有很好的可及性。紧密的一体化增强了欧盟所有区域之间的可接近性，但是核心区域之间的可接近性增加似乎比外围层之间的可接近性增加的要快。

当用欧盟的人均 GDP 来进行对比时就会发现欧盟存在强烈的核心——外围模式：富裕的区域以一个蓝色的橡胶形从英国的东南部一直到荷兰，从德国的西部开始弯曲（这样就形成了橡胶形）直到奥地利以及意大利的北部。丹麦以及区域金融中心巴黎，斯得哥尔摩以及赫尔辛基看起来就像局外人一样。工资以及就业得图也展示出同样的模式。尽管 Overman 和 Puga（2002）所作的一项研究表明这个模式就失业率而言并不是那么显著。

当我们用 1966 年的数据总 GDP 而非人均 GDP 来对比就会发现当我们用总 GDP 的时候，欧盟核心——外围模式就不是很显著了。这个比较就揭示了欧盟经济活动空间分布的另一个关键事实。人口（因此总的经济活动）在欧盟范围内仍在向外扩散，尽管欧盟地区人均 GDP 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

还有一些证据表明这种国家之间的人均 GDP 的核心——外围模式正在被弱化，而各个国家内部的这种模式却很稳定。

二、我国与欧盟城市化进程的几点比较

1、我国农民的有效城市化需求不足

我国 1978 年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方面较大的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但另一方面这种制度越来越具有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特点：它将大量的农民限制在土地上，自谋生路。然而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农产品价格的回落、农民增收缓慢以及城市对农民工需要的增加，我国大量的农民进入城市“打工”挣钱。但是数据表明ⁱ，这些打工人员并不打算留在城市，更多的人还是要回归农村。因此就形成了所谓的农民兼业化现象。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由于农村居民的能力（受教育水平、资金实力、谋生技能等）与城市居民存在巨大的差异，因此即使这些农民想留在城市生活，他们也只能从事低级的工作甚至不可能被城市所认同ⁱⁱ。换言之，他们城市化的有效需求严重不足。另一方面，从一定意义上讲，农民成了投机分子：由于农民工的竞争优势（年龄优势、工资优势），这种投机使得农民工一方面占用了本属于城市下岗人员的职位，增加了城市再就业的困难，另一方面农民的短视行为（挣钱回家盖房、还债等）又增加了对农民进行城市化的沉入成本，进而增加了农民城市化的成本。因此，我国农民的有效城市化需求不足的主要原因在于农民的兼业行为导致了农民的投机行为，使得农业对农民城市化的“推力”显得不足；另一方面由于城市相对高房价与农民相对较低的谋生能力的影响，使得城市对农民的“吸引”也相当不足。这方面英法两国的实践对我国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作为对比的是，英、法两国在城市人口增长方面的经验对我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1801 年，英国城市人口占全国人口的 33.8%，以后花了约 50 年，到 1851 年，把城市化率提高到 50.2%。在法国，与此相近的变化用了约 66 年。此外，英国实现城市化在 19 世纪前半期，法国城市化发展较快的时期却要从 19 世纪 60 年代以后起。而在那时，英国又迈向更高的阶段了。

究其原因，主要在于英、法两国城市人口的来源。虽然它们的城市人口主要都来自农村，但由于农业结构和发展状况不同，人口来源相差甚远。自 16 世纪前后开始，英国的土地分配制度在经历着一场彻底的变革，小农土地占有制逐渐被消灭。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农场经营方式渐趋确立，这对于提高农业生产率无疑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早在 17 世纪后期，英国农业革命已逐步展开，休耕地渐趋消失，农田的连续轮种制开始占据主导地位；新的农作物不断得到了引进和推广；传统农具有了较大改进，新式农具也不断从其他地区流进英国；粮种选择和家畜育种不断进步，土地开垦速度加快，使用马匹耕种土地的比率逐年增大。另一方面，在英国，圈地运动是剥夺农民土地，推动农村人口转移的重要因素之一。英国的圈地运动是以牺牲农民的利益换取了工业化、城市化的迅速发展。英国的圈地运动早在 15 世纪就开始了，到 19 世纪上半叶，英格兰圈地总面积约 650 万英亩，约占英格兰总面积的 20%。在 1780—1820 年间，土地所有者人数减少了 40%—50%。在此过程中，农业生产规模的扩大、农业机械的采用、排水和施肥技术的实施，加上合理的组织和劳动分工，使农业劳动生产率、单位面积产量都有明显提高。这两方面因素的结合，使得英国产生了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这也推动了英国的城市化进程。英国自圈地运动以来，畜牧业在农业中的比重日益增加，形成一种混合型结构的农业。据统计，1808 年，英格兰和威尔士的耕地面积占开垦土地面积的 39.82%，而牧场和草地面积所占的比例高达 60.18%，畜牧业所需的劳动力比耕作业相对要少，因此，产生的剩余劳力比较多。此外，英国工业化开始早，为农耕生产改进技术和工具，提供了比其他国家更为优越的条件。耕作业所需的劳动力也在逐年减少，使大批人口流入城市。

法国的情况则与英国不同，工业化高潮时期在 19 世纪中叶以后。由于封建制度的根深蒂固，法国的农业革命只是到了 18 世纪中叶才开始出现，各种比较先进的农业技术才逐渐得到运用，因而在此前的很长一段时期里，其农业水平均未能有长足的进展。而且，法国农业的发展有一个致命的弱点，这就是小农经济的普遍存在及其不断强化的趋势，土地极端分散，农业生产的规模化经营迟迟得不到发展，这对法国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产生了长期的阻碍作用。在近代早期，英法两国不同的农业生产率水平直接影响着各自的城市化发展步伐，农业生产率的高低成为城市化进程最有力的促发剂或钳制器。另一方面，就人力资源而言，工厂劳动力往往供不应求。因此，法国长期盛行“家庭加工”的办法，制造商或承包商把原材料委托给地方，分配到户进行加工。这样在很长一个时期中，法国的城市并没有英国那样大的吸引力。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与法国的农业结构紧密相关。法国由于地理和气候条件，除粮食作物外，果木园艺业和养蚕业作为传统生产部门，在农业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类农业要求精耕细作，占有的劳动力较多，又特别需要稳定一支有一技之长的专业队伍。另外，小农经济在法国农业中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土地对农民的维系力较强。所以，农业将其人口向外转移的“推力”不足，使农民与土地的分离经历了一个相当缓慢而长期的过程。

2、我国存在严重的市场分割现象

建立统一的全国大市场，是从计划经济体系向市场经济体系转型所要达成的最重要目标之一。但是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最近组织的一项全国性的调查表明，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的问题，仍然没有根除，在有些地方和行业，还比较严重。(李善同等 2003 a, b) 商务部最近对全国 22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一次调查显示，有 20 个省市均有产品或服务遭受地区封锁的侵害，有的还十分严重。

改革以来中国的地方保护和和市场分割，很大程度上是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在分权式改革下的逻辑延伸。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分权时，并没有伴随着发展战略的彻底转变，相反，由于不了解一个国家的产业和技术结构其实是内生于其要素禀赋结构，并且由于把发达国家具有优势的产业和技术作为发展中国家现代化所奋力追求的指标(林毅夫 2002)，不少地方政府延续了过去的发展战略思想，发动了程度不等的新一轮赶超。相对发达的地区想保持自己的领先地位，在产业上赶超国际上先进的国家；相对落后的省份想赶超相对发达的省份。

新的赶超的一个常见例子是，各级地方政府的官员，都把延长产业链、提高当地产品的附加价值，作为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而事实上，一个地区的制造业是否具备精深加工的能力，不是由政府部门和官员的主观愿望决定的。在当地的基础设施、技术工人队伍、工程技术力量、资金供给等客观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新的赶超只有在各种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的情况下才能实现。

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的政策措施五花八门，比如，通过各种手段限制外地产品流入，为生产同类产品的本地企业创造垄断的市场空间；干预司法体系，偏袒本地的企业；默许、纵容、甚至和当地的企业合谋，绕过国家的产业和土地政策，给予低价的土地，上马赶超项目；凭借行政力量影响银行系统，为当地企业融通资金等(李善同等 2003 a, b)。另一种更为糟糕的地方保护主义表现为一些地方政府以招商引资、增加税收、创造宽松发展环境为由，阻碍了跨省区的打假行动，不允许执法部门进行检查，客观上刺激了造假产业的发展。ⁱⁱⁱ

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对我国的生产率提高，带来了负面的影响，不仅降低了资源配置的静态效率，而且降低了经济增长的速度。如果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不能根除，那么其对生产率进而对整个社会福利的影响，不仅仅在于短期之内的增长效应(降低增长率)，还有长期内的水平效应(降低长期的稳态水平)。因此，打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是我国今后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一个重大任务。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由于新技术不断的出现，西欧各国各地区之间的分工与依赖日益加深，生产社会化、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使各国的生产和流通及其经济活动进一步越出国界。这就必然要求消除阻碍经济国际化发展的市场障碍和体制障碍。1957 年 3 月 29 日法、意、荷、比、卢、西德六国首脑和外长在罗马签署了两个条约，即《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欧洲原子能联营条约》，统称《罗马条约》；六国先后批准，于 1958 年 1 月生效。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统一的大市场客观上促进了欧盟国际经济的合理布局，在这种体制下，各个国家可以按照本国、本地区的技术条件、技能条件依据比较优势进行产业布局，从而实现了经济的互补。到 20 世纪 80 年代后，欧盟的产业结构就呈现了比较合理的布局模式，见表二（如下图）：

Table 2: Specialisation patterns in the EU

Country	1970-73	1980-83	1988-91	1994-97
Austria	0.314	0.275	0.281	0.348
Belgium	0.327	0.353	0.380	0.451
Denmark	0.562	0.553	0.585	0.586
Spain	0.441	0.289	0.333	0.338
Finland	0.598	0.510	0.528	0.592
France	0.204	0.188	0.207	0.201
Great Britain	0.231	0.190	0.221	0.206
Germany	0.319	0.309	0.354	0.370
Greece	0.531	0.580	0.661	0.703
Ireland	0.701	0.623	0.659	0.779
Italy	0.351	0.353	0.357	0.442
Netherlands	0.508	0.567	0.547	0.517
Portugal	0.536	0.478	0.588	0.566
Sweden	0.424	0.393	0.402	0.497
Weighted average	0.326	0.302	0.33	0.351

Note: Minimum values for each country in bold font. Calculations based on four year averages at the dates indicated.

类似的结论。Midelfart-Knarvik et al (2003) 使用同样的数据进行双边对比发现，在 91 个不同的组合中，有 71 对显示出 20 世纪 80 年代早期到 20 世纪 90 年代期间它们的差异在增大。

鲁格
et al
这三
爱尔
三个结
芬兰的
与、技
也是
是中
技术），
的专
工业化
还可
的专
强化。

另外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德国的统一的影响。德国的统一扫除了德意志经济中的最大障碍，加速形成了统一的民族市场。统一后的德国，在 19 世纪后半期，出现了德国历史上最引人注目和最令人惊异的经济转变。德国统一后煤炭工业和钢铁工业的结合就促进了兴建铁路高潮的出现。1870 年德国铁路 18560 公里，1890 年增至 41818 公里，为西欧和中欧之冠。铁路将德国分散的市场有效且高效的联结起来，有力的促进了工业发展。这样在大约 30 年时间内，德国经历了英国用 100 多年才完成的工业革命，将一个农业占优势的落后国家转变为一个近代高效率的工业技术国家。德国正是在这个期间“从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转变为以工业为主的国家，从一个‘诗人和思想家’的民族转变为以工艺技巧、金融和工业组织以及物质进步为公共生活的显著特征的民族”。统一后的德国，不仅经济迅速发展而且社会结构也发生了变化，使之向着近代化的目标迈进。社会经济结构变化表现在四个方面：首先是改变了工农业的比例；第二是改变了轻重工业的比例，改变了生产资料部类同消费资料部类的比例。第三，科学技术因素已成为工业生产力诸因素中的决定性因素。德国统一后工业经济跳跃式发展的根本动力是先进的科技，这其中既有向先进工业国学到的，也有德国人自己的发明创造。据不完全统计，从 1851 年至 1900 年，在重大科技革新和发明创造方面德国取得 202 项，超过英法之总和，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从整体上看，当时德国的科学技术是在世界的前列。科技近代化是德国工业革命完成的标志之一，也是德国近代化的主要特征之一。正因如此，德国的综合国力很快赶上和超过英国和法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科技化工业强国。第四是由工业革命和工业化促成的城市化。在德国，城市化的开端在统一前就有所发展。但德国政治上的统一，对生气勃勃的经济发展的构成了强大刺激。因为统一不仅决定性地推动了工业革命的胜利进军，而且为城市的发展消除了许多障碍。

3、中欧城市化过程中工业化面临的市场背景不同、市场需求弹性不同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化程度不断提高，甚至享有“世界工厂”的美誉。尽管如此，但是我国的贸易条件并没有得到多大程度的改善，这主要体现在我国尤其是珠三角地区工业的技术进步异常缓慢，基本上还是从事劳动密集型产业。由于世界竞争的加剧，它们的盈利能力不断下降，因为吸引不到所需要的民工，从 2004 年 1 月起，有着近 9 亿农民的中国首次遭遇了“民工荒”。在广东东莞首次官方确认民工紧缺以来，随后此波迅及整个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湾地区，并向中西部地区纵深发展，其中尤以珠三角地区为甚。单深圳、东莞两地即缺农民工超过 50 万，据有关专家估计，广东省缺农民工近 200 万。而根本的原因在于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没有得到保障，如拖欠工资、工作环境恶劣、受人歧视、随意加班等；农民工工资增长过慢；进城务工成本不断升高等。也就是说，我国工业化出现了所谓的“两难困境”：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产品竞争能力有限，而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缺乏资金投入以及 R&D 意愿投入（部分外商甚至不愿进行这方面的投入）；根本原因在于我国工业化所面临的市场背景 and 市场需求弹性和欧洲城市化时所面临的状况差异很大，我国工业产品的资金供给渠道单一、市场需求以及原材料供应弹性巨大，城市的“集聚效应”很难发挥出来，进而影响城市化的进程。

欧洲国家在漫长的工业化、城市化时期，为了解决资金的原始积累、原材料来源地以及产品销售地的难题，它们不断的通过建立殖民地或者进行公开掠夺来解决工业化过程中的市场、资金、原材料问题。在产业革命时期，葡萄牙、西班牙早在 16 世纪，英、法、荷在 17、18 世纪就开始了殖民扩张。它们的特点在于：公开掠夺殖民地的金银财富，事实上有效的解决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些国家在政治上直接征服、瓜分世界，在经济上以资本输出为主，商品输出为辅。各国扩张程度方式有所不同：英国以枪炮为后盾，经济侵略为主；俄罗斯以军事侵略为主，扩张领土；德国由于发展较晚而没有殖民地可掠夺，因此通过战争（一战、二战），赤裸裸地掠夺（豪夺）；苏联则代表了另一种现代化模式，一方面苏联没有海外殖民地可以掠夺，另一方面又身处帝国主义列强的包围之中，无法通过对外战争攫取赔款，所以只能通过自己勒紧裤腰带实行现代化了，换言之，就是通过工业对农业的剥削的方式。结果 20 世纪初就基本形成

了世界殖民体系：亚洲除日本外，大都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非洲绝大部分成为殖民地；拉丁美洲实际成为依附英美的半殖民地；这些殖民地的开拓，为这些国家提供了广阔的商品市场以及廉价的原料产地，事实上刺激了这些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从二战后到 20 世纪 80 年代末，国际产业资本主要是在发达国家之间流动，由此形成了发达国家间的产业内分工体系，国际贸易的主体也从初级产品为主转向工业制成品，约占到 80%；而目前，国际产业资本的流动方向是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但与第一阶段不同是，投资领域已不是开发初级产品，而是发展制造业，是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转移，国际贸易结构也相应地从以前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输入工业制成品，转为是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输入工业制成品。广大的市场、廉价而丰富的原材料加速了欧洲工业化的进程，并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欧洲城市化的进程。

三、欧盟城市化对我国的建议

1、切实采取措施消除市场分割

打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首要的条件是放弃赶超战略和消除原有战略给予企业遗留下来的战略性和社会性政策负担（林毅夫 2004）。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我国目前的地方政府保护和市场分割行为，实际上是原来中央政府主导的赶超战略和体制的逻辑延伸。所以，中央政府彻底放弃赶超战略，改变对基层干部的考核体系，是至关重要的。党的十六届二中全会的《决定》已经明确提出了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提出了“五个统筹”的标准。这些发展理念的确立，使得我们有理由相信，我国的地方政府保护主义将逐步得到消除。进而可望消除我国各省市之间的高度趋同的产业结构现象，从而使得各省市能够依据自身的比较优势进行合理的产业布局，进而促进我国的城市化进程。

2、应重点培育国内市场，继续推行“扩大内需”的政策

作为一个拥有 13 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我国国内市场潜力大，城乡居民消费需求大，经济发展的回旋余地大，这是我国多年来经济增长的基础和优势，也是我国今后经济发展的优势。而从国情和地位来讲，我国也不应该把经济增长的希望寄托在扩大海外需求上。世界上大国经济的发展都是主要依靠国内需求的增长。美国是世界上出口额最大的国家，其出口总额也仅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 8%，其余 92% 都是靠国内需求实现的。所以，对祖国大陆来说，扩大内需绝不仅是权宜之计，它应是一项长期的发展战略。目前我们国家吸引外资的政策仍然还是优先吸收劳动密集型、外向型的产业。尽管我们国家虽然获得了“世界工厂”的称号，但是不可忽视的是，世界各国针对我国的反倾销案件逐年增多，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难度（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竞争，尤其是国内厂商之间的恶性竞争、关税壁垒以及非关税壁垒等的限制）越来越大，也就是说工业产品海外市场的需求弹性越来越大了，因此为了给我国工业化的产品提供持续、巨大而易于控制的市场，国内市场应是首选。因此应加快推行农村税费改革、农产品价格改革以切实提高农民收入，刺激农村居民的消费，从而实现目前的投资需求拉动转变为消费需求拉动。尤其是在全球经济增长缓慢的时候，培育国内市场是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根本保障。借此机会，也可以削弱国内市场分割对我国工业化的影响，进而促进城市化的发展。

3、应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素质以增加农村劳动力的有效城市化需求

因此要积极推行面向农民的职业教育和技术培训，逐步提高农民的自身素质，为农村剩余人口的转移作准备。各级地方政府应发挥在农民职业教育和技术培训领域内的主导作用，即对农民的职业教育、技术培训应带有某种制度上的强制性。国家应从法律上确立农村劳动就业预备制度，即严格规定，完成了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农村劳动力无论到城市就业或是留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均须接受职业教育和技术培训；相应地，城市用工单位应依法从取得资源证书的农村求职者中录用职工。在我国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可采取国家、用人单位与个人共同出资的办法解决贫困农民的培训费用

问题。对贫困农户，政府可采用小额贷款予以扶持；对于国家级贫困地区农村则主要由当地政府出资为农民举办职业教育和技术培训，其经费可考虑在扶贫资金中解决。国内外的经验教训表明：惟有以战略眼光看待农民人力资源能力建设问题，摆脱重物(质资源)不重人(力资源)的“路径依赖”，在人力资本上舍得投资，就一定能扶助农民跨越进城这道无形“门槛”，促成城市化进程，从而加快我国现代化的步伐。

参考文献

- [1] Paul M Hohenberg : THE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EUROPEAN CITIES:AN INTERPRETIVE ESSAY ; Rensselaer Polytechnic Institute (Emeritus) ;
- [2] Pierre-Philippe Combes , Henry G. Overman :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economic activities in the European Union' , 11' July 2003 ;
- [3]Diego Puga : Urbanisation patterns:European vs.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 ; Discussion Paper No. 305, September 1996 ;
- [4] 顾朝林.城市化的国际研究[J].城市规划, 2003,(6) .
- [5] 冯尚春.发达国家城镇化及其对我国的启示[J].城市发展研究,2004,(1) .
- [6] 黄柯可.英美法德俄城市化特点以及出现的问题[J].兰州学刊,1994,(2) .
- [7] 康宛竹.试论近代早期西欧城市化道路及其与农业的关系[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1) .
- [8] 师谦友,冯革群,严艳.德国统一的空间经济格局变化分析[J].人文地理,1997,(12) .
- [9] 羊海飞,丁建弘.浅谈德国统一与德国现代化[J].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2,(11) .
- [10] 冯超英,贾保维.浅谈德国统一对德国近代城市化进程的影响[J].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7) .

The Revelation of EU Urbanization to Our Country

WU Lao-er¹, CAO Ji-yun²

(1.Nankai Institute of Economics, Nankai University, 300071)

Abstract: The phenomenon of urbanization at first occurred in Europe. Now our country is in the stage of increasingly urbanization. After we contrast the experience of the European urbanization, we find that: the market background of our country's industrialization, market condition and the subject of urbanization ——peasant taking a pluralistic occupation to some extent is similar to that of Europe, but at the same time they are quite different in other aspects. Other's experience may help us, so we can learn from the lessons of European urbanization and take some measures in building up domestic market, getting rid of "separated market" and promote the valid demand of urbanization so as to urge the urbanization progress in China and reduce the unnecessary cost as much as possible.

Keyword: Urbanization; Separated market; Domestic market

收稿日期: 2004-12-20

ⁱ 聂毅：贵州省外出打工人员挣回 69 亿，金黔在线 2004 年 1 月 8 日；

ⁱⁱ 杨耕身：新京报：驱走拾荒者--城市无权选择自己的人民；2004 年 12 月 06 日；

ⁱⁱⁱ 冯杰：新京报 <http://www.sina.com.cn> 2004 年 12 月 19 日；